

美日谈判与轴心联盟

韩永利

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美日谈判,以往国内的研究,多以美日间在中国问题上的角逐为中心内容,而忽略了美日谈判与轴心联盟的关系。其实,弄清楚这个问题,对我们进一步了解美国对日谈判的最初动因,尤其是从美国全球战略的角度看待其远东政策是有帮助的。

一

美国首脑同意与日本展开谈判的最初动因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拆散德意日三国轴心同盟。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签署的三国同盟条约规定:德意日三国相互承认彼此在欧洲和亚洲的“领导地位”。在条约第三款中,德意日向全世界公开宣称:在受到第三国——未参加中日战争和欧洲战争的国家攻击时,进行互相援助^①。通过这一条约,日本公开把自己绑在轴心战车上,条约的目标直指美国。

条约激怒了美国公众,敌视日本态度骤然加剧。大多数美国人承认,日本参加德意轴心同盟已构成对美国安全的现实威胁^②。长期鼓吹美日友善、与日本财界有密切联系的美国商界大亨们也开始被迫转向。《商务周刊》代言:“假如日本一意孤行,……我们商务界人士必须准备承受市场丢失的压力。”^③美国“国家外贸常设办事处”宣布:“粉碎轴心国支配世界的迷梦是和平和各民族繁荣的出发点,……美国对日本实行贸易控制是必要的^④。1939年5月15日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日记中预言:“假如日本因全面军事同盟的关系而被绑在纳粹阵营内,要美国仍与日本和平共处,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⑤1940年10月4日,罗斯福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如何应付三国同盟建立后的严重局势。陆军部长史汀生、财政部长摩根索、内务部长伊克斯极力主张:“采取一些直截了当的行动,表明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对它(日本)毫不畏惧^⑥。国务院远东司顾问霍尔拜克在给国务卿赫尔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实际上处于战争之中,必须随时准备同日本战斗。”^⑦海军部长于10月5日公开发表演说:“三国公约是直接针对美国的,美国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这些人士几乎一致主张以强硬措施教训日本。在舆论推动下,罗斯福总统宣称:“欧洲和亚洲独裁国家的结合,绝不会使我们在自身生存和民主事业前进的道路上止步,……美国人民……反对绥靖主义。”^⑧

三国轴心同盟的建立在美国引起如此强烈反响,主要原因是由于欧洲严峻的局势。

首先,德国击溃英法联军,横扫西北欧,已形成雄踞欧洲的大帝国,如德军进而攻占英伦三岛,美国将失去唯一屏障直接与德国对峙。对此,罗斯福十分清楚,他说:德国击溃英国之后,下一步计划将是荷兰和法国在拉美的殖民地,将给美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⑨。主张援英抗德的“怀特委员会”呼吁:“英国垮了,美国就会孤立,美国在对付欧洲形势上必须采取

主动地位。”^⑩从法国沦陷开始，美国就积极研究如何支持英国顶住德国。从此，美国实际上已卷入欧洲战争，成为英国的盟友，美德之间已成为不宣而战的敌对国。日本在这个时候公开投身于德国阵营，促使了美日之间矛盾的加剧。美国学者戴文·罗伯特分析说：美国已明白，美国必须慎重对待的外部战争，不再是区域性的，而是两洋军事威胁这一事实^⑪。“怀特委员会”当时就表达了这一意思：“三国同盟的建立使两个战争合为一体。”“来自太平洋的威胁和来自大西洋的威胁同样重大，是连成一片的战争阴云。”^⑫众所周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美国除了做做表面文章表示对中国的同情之外，更多的是反复强调与日本的友好关系。三国同盟的建立，促使了美国在对日本态度上的变化。

其次，与上述相联系，日本加入三国同盟，在美国看来，是策应欧洲战争，阻碍美国援英抗德方针的施行。日本与德意联盟，为其南进争取到了国际后盾，对英国远东殖民地造成威胁。日本如攻占东南亚，英国至远东的生命线将失去依托，被断绝重要战略和生活物资来源的英伦三岛只有坐以待毙，美国御德于英吉利海峡的计划将付诸东流，前景将不堪设想。

第三，三国同盟条约第五条规定：“日本、德国、意大利确认，上述各条款对三缔约国各自同苏联之间现存的政治状况无任何影响。”^⑬德苏之间尚存在“互不侵犯”的协定，因此，同盟矛头直接对准美国。

由于上述原因，美国政府与军界必须从欧亚两个方面，针对三国同盟制订出应付局势的战略方针，也就是说，美国这一时期军事政治战略制订的基点是放在三国同盟现实威胁的总体基础之上。但是，无论从当时美国的军事经济实力（经济未纳入战争轨道），还是从社会舆论、民众心理上（美国未宣战），美国都不具备同时对付德日的现实力量。因此，美国从三国同盟建立到1941年3月的讨论制定战略的过程中，权衡利弊，最后确立了对付轴心联盟的反措施——“先欧后亚”大战略，首先打击德国。罗斯福在这个正确的战略考虑上是始终如一的。三国同盟建立的第二天，他就说：“我们第一位忧虑的是大西洋。”10月4日，他在内阁会议上重申：“欧洲第一”^⑭。11月，海军部呈送罗斯福一份报告中指出：“我们不能丢失任何地方，同样，我们也不能在每一地区赢得胜利，力量分布应有侧重。”^⑮因此，1941年3月，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美国主要军事力量用于对付德国，即使在日本决定介入战争的情况下也遵守这个战略^⑯。

在这个战略指导下，美国的近期目标，就是支援英国，粉碎德国对英伦三岛的攻势，维持大西洋交通线。在远东，则是稳住日本，不使其过早地南进夺取英荷殖民地，策应德国。

美国希望稳住日本的手段有三种。其一，给中国有限的军事经济援助，使中国能与日本打下去，不致于过早失败，陷日军主力于中国大陆。“在美国不冒风险的情况下，堵住日本进一步侵略。”^⑰其二，逐步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如扩大战略物资禁运范围，断绝日本扩大侵略的后路。其三，通过与日本谈判，分化三国同盟，既限制日本南进，又孤立德国。前两种手段随着日本南进准备的升级而不断加强，这是我们分析美国远东政策从绥靖到抗衡转变的客观依据。但是，就美国首脑主观意向而言，抱希望最大的则是第三个因素。在美国看来，如果能拆散同盟，全力应付欧洲战争，这是既省力，又不担风险，而且可以达到其战略目的的上乘之策^⑱。以赫尔为首的国务院倾全力从1941年4月开始这一工作，其导因就是日本方面向美国表示出对同盟的离心倾向。美国决策人物对此寄予厚望。

从以上分析看，美国决定与日本谈判是其对付轴心联盟总体战略的逻辑产物，其中又注入了拆散联盟的初衷，正如赫尔所表述的，是准备“打一场后卫外交战”。

那么，美国政府在谈判中究竟是以何种手段来达到拆散轴心同盟，实现“先欧后亚”战略呢？积极的目的应辅之以积极的手段。然而，美国政府却未能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从1941年1月日本提出与美国谈判要求到7月日本进占印度支那南部，这是美国企图通过谈判拆散轴心同盟的最盛期，而恰恰在这一阶段，美国准备以牺牲中国利益作出妥协。

从1940年中期开始，日本就有两个忧虑：第一，中国问题是日本南进的严重障碍，欲扫除它，必须阻止美国支援中国，促使中国屈服。第二，日本南进准备尚未就绪，美国逐步加强物资禁运对日本南进战略储备不利。因此，想通过谈判缓和与美国日趋紧张的关系。日本政府首脑近卫等人深知美国对三国同盟问题反应强烈，要求谈判也就从这一敏感问题入手。

1941年1月，日本首相近卫托美国神父沃尔希和德劳特携带秘密备忘录面呈罗斯福和赫尔，内容是：日本虽然承担三国公约的义务，但是，如果德国进攻美国，日本同意支持美国。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必须协同日本促使中日战争结束，并阻止任何其它国家改变东南亚形势^①。近卫的秘密建议引起了美国首脑的极大兴趣。赫尔认为，中国在美国战略中只具有第二位的作用，首先应解决大西洋方面的问题。日本国内存在着对三国同盟持不同看法的派别，他们不赞同日美关系恶化，可以利用。再则，三国同盟也并非铁板一块，或许有达到分裂的可能^②。因此，罗斯福、赫尔同意与日本方面展开非正式会谈。同时，日本方面在人事上作了精心安排，由对三国同盟持异议的野村吉三郎代替堀内为驻美大使^③。

为了使日本明白美国接受谈判的意图，1941年2月14日，罗斯福接见野村时一针见血指出，“三国同盟困扰了美国人民，美国认为三国正一致努力，德国伸展到中东，日本经新加坡进入印度洋。”同一天，美国驻日大使馆参赞杜曼在和日本外务次官会谈时也指出：“如果日本忠于三国同盟，介入欧战，那么美日关系的和解是不可能的”^④。

3月17日，日本合作银行高级职员三河与德劳特草拟了一份方案，经新任驻美大使野村修改后，4月9日交给赫尔。关于欧洲战争问题，日本政府将声明：三国公约的目的在于防卫，只有其中一国遭到目前尚未卷入欧洲战争的国家侵犯时，才履行公约规定的军事义务。美国政府应声明：它无意缔结任何“侵略同盟条约”去帮助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美国对欧洲战争的态度将“完全出于保护本国福利和安全考虑。”关于中日战争，日本要价很高：美国总统应促使中国承认满洲国，重庆政府与南京政府（汪伪政权）合并，如中国拒绝这些条件，美国应停止对其一切援助^⑤。很明显，这个建议案比近卫的秘密建议的调子低了许多。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官员特别反对关于中日战争部分的说法。但是，赫尔不愿中止谈判，他甚至认为提案的某些部分是可以接受的，日本在欧洲问题上作了让步，轴心联盟仍有分裂之可能。他的担心在于：这个谅解案送到东京，如果日本军人不同意，“美国将进退两难。”他甚至暗示野村说：“关于满洲国问题在将来会谈中要讨论。”^⑥这样，赫尔开始表现出为了欧洲战争，为了拆散轴心联盟，准备在中国问题上作出某些妥协的意向。

4月17日，日本内阁大本营召开联席会议，日本军方激烈反对提案中关于三国同盟的部分。陆军参谋总长指出，美国不反对这个谅解案的原因似仍想控制德国，并使太平洋安定一时，日本虽然原则上可以接受此案，但与三国条约的本意有势难并立的关系^⑦。4月22日，外相松冈完成德苏之行回到日本，对谅解案发表意见：“用讨好美国的办法来调整日美邦交，不仅最终难以实现，而且还将产生相反的效果。”他主张，利用三国同盟来牵制美国，阻止美

国参加欧洲战争，并使它不再插手中国事变。在军方和松冈的反对下，5月3日联席会议通过了日本政府第一次修正案，关于欧洲战争，日本政府声明，轴心同盟是防御性质，其目的在于防止现在尚未参加欧洲战争的国家参加战争；根据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军事援助义务在发生该条约第三条规定情况下自应予以履行^②。这样，关于对三国同盟的态度，日本的修正案要强硬得多。随后，松冈首先向野村发出两点指示，一是建议与美国签述互不侵犯条约；二是向赫尔转达松冈的口头声明。声明的大意是：德意两国领袖对胜利抱有信心；美国参加欧洲战争就是延长战争和毁灭文化；日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干有损于轴心国联盟的事情^③。日本如此态度，在美国看来，是抽掉了整个谈判的基础。5月6日，作为对日本强调轴心国关系的反击，罗斯福正式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7日，赫尔断然拒绝了日本提出的签订日美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并针对日本的修正案和松冈的声明，明确告诫野村：“美国决心阻止德国控制海洋。”^④尽管如此，罗斯福和赫尔都不愿放弃几个月来的努力，始终盼望有机会使日本脱离三国同盟^⑤。因此，美方又提出日本5月3日修正案的对策，明确说明美国准备就“满洲国问题”与日本进行友好谈判，日本则在美国对德国采取防卫和自卫的措施时不履行三国条约规定的义务^⑥。美国欲以中国利益为代价换取日本让步的意图开始付诸行动。

但是，日本并不“谅解”。5月27日，松冈发表挑衅言论：“如果美国武装护送商船到英国，美德发生战争，日本将决定美国为侵略国，美日战争将爆发。”赫尔声明：“日本人正在强调轴心联盟的意义”。然而，在谴责日本对欧洲战争和轴心联盟态度的同时，美国却准备了第二份非正式修正案，其中中日和议部分提出：美国总统将劝告中国政府，在中日政府相互有利且能同意的基础上，进行结束战斗行为及恢复和平关系的谈判。在正文的注释中说：反对日本军队留驻中国，但可以允许日本相当长的时间在中国驻军，……准备今后讨论承认“满洲国”的问题。为了使日本明白美国作出如此让步的苦心，赫尔在草案中提出通过日美互换照会的方式，使三国公约不适用于美国卷入欧战的情况^⑦。这个提案无疑将美国在谈判中的绥靖态度推向了高潮，使拆散三国同盟这个积极目的黯然失色。同时，极大地损害了正在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感情。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人民意愿，毫不客气地谴责美国制造“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⑧。

自然，历史没有容许美国跨出这一步。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赫尔不失时机地向野村提出，这是日本摆脱三国同盟约束的好机会。野村断然回答：日本不会抛弃三国同盟^⑨。美国几个月的努力付诸东流。

兹后，从8月到11月底的谈判中，尽管美国部分首脑仍存有拆散三国同盟的想法，在其远东政策中仍残留有牺牲中国的绥靖阴影，但从总的趋向看，美国已经改变了谈判主旨，即以谈判延缓与日本开战时间替代通过谈判拆散三国同盟。这是因为：日本南进准备大致就绪，进入印支南部已完成战略基地的控制；德国主力挥师东进苏联，西线局势趋于缓解，三国同盟问题在谈判中作为筹码已失去原有价值。日本多次提出不履行三国条约，企图换取美国在中国问题上让步，美方均未松动。在这后一阶段的谈判中，从美方的提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三国同盟问题已被放到了中日战争问题之后^⑩。

总之，美日谈判中呈现了拆散三国同盟与牺牲中国利益的积极与消极两种因素，其导因是美国倾全力奉行的“先欧后亚”战略。中国共产党领袖们当时也注意到这一点。周恩来曾分析说：“太平洋上的冲突是迟早不可避免的，但在英美政府主观看来，他们不能听任地中海的失败（应该也包括在大西洋方面的不利局势——笔者），而且要用全力来转变目前局势，所以暂时和缓太平洋上的冲突，也是他们政策的当然逻辑。”^⑪

作为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对日谈判以拆散三国同盟的意图应该值得肯定。但是，以消极手段，或者靠以牺牲他国甚至盟国利益去达到某种战略目的，这不但违背国际道义，同时注定也不能成功。美国在谈判中牺牲中国利益的倾向给“先欧后亚”战略在远东的具体实施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先欧后亚”战略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总战略之前，美国主要是根据本国直接利害关系和利益大小来实施这一战略的。这反映在远东政策中，就是把对付三国轴心的法码主要压在美日谈判上，不切实际地希望日本脱离三国同盟。

首先，美国单纯地把三国同盟的建立看作是策应欧洲战争的产物，认为只要拆散这个同盟，赢得欧洲战争就有了保证，这就过高地估计了德日之间的相互策应意向。实际上，这恰恰是对日本参加三国同盟动机的错误分析。表面上看，三国同盟条约将使德意日在欧亚遥相呼应，这是美国特别担心的。因此，美国极为看重同盟条约的第三条，即德意日的相互策应和援助。这样，美国就步入了一个误区。事实上日本从同盟建立始，就没有策应欧洲战争的打算。日本要得到的是同盟条约第一条，即德意承认日本在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为南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争取国际后盾。

1940年9月14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和日本外相松冈讨论签约时提出，缔约国中如有一国受到没有卷进欧亚冲突的国家“公开或以隐蔽方式进攻”时，该公约所规定的军事义务就应该履行。松冈当即就反对这种提法，认为在美国尚未参战时就去帮助德国不妥，结果删去了“公开或隐蔽的字样”，换为“如果一个没有卷进欧战或远东冲突的国家对缔约国中的一方“犯下侵略行为”，日德意“保证向该侵略国宣战，并以一切政治、军事、经济手段相互援助。”日本海军极力反对担负明确宣战义务，结果又删去了“保证向侵略国宣战”的字样^③。

日本外相松冈是被赫尔视为订立三国同盟的罪魁。他在回答日本内阁和大本营联席会议关于三国同盟条约的咨询时说：“这个条约将迫使美国在执行反对日本的计划时更谨慎从事，……再则，如果德国真的与美国打起来，日本也没有义务自动地援助德国。”^④野村在谈到美日谈判的使命时也说，其实，日本绝不会自动地卷入欧洲战争，甚至在美国进入欧战时也不会^⑤。战后在纽伦堡审判中，德国纳粹头目供认，1941年春，德国多次敦促日本进攻新加坡以策应德国在大西洋方面的战事，屡次都遭到日本回绝，理由是要看到德国登上英伦三岛之后^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德国能登上英国本土，也无需日本策应了，表明日本并不受德国支配。1941年中期，美国在大西洋扼制德国潜艇的不宣之战日益升级，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让德国驻日大使奥特敦促日本政府，声明美国在大西洋正在从事侵略性战争，日本将履行三国同盟条约，支持德国。但是，日本拒绝向美国提出警告。因此，里宾特洛甫极不满意地表示：日本从来就没有按德国的意见办过，他们完全自行其事^⑦。应该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即使在形式上，日本也没有按照条约所规定的那样行事过。

日本真实用意是把三国同盟作为实施自己南进侵略国策的一种工具。1940年7月23日，近卫在“拜受敕命”讲话中谈道：“在外交上，必须始终站在帝国独立自主的立场上，走帝国独自的道路，……依靠自己力量建立世界新秩序。”7月26日，日本内阁在《基本国策纲要》中指出：“应建立以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坚强团结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7月27日，日本大本营内阁联席会议明确规定了与德意发展轴心关系的政治军事目的：解决中国事变之后，伺机

南进^④。松冈也曾说：“……日本应所处的地理位置，能保持独立，不象意大利那样从属德国，……日本应利用欧洲战争的机会，对法国、荷兰、葡萄牙在远东的领土发动突然袭击。”

8月初，松冈与来栖（日本驻德国大使）分别在东京和柏林向德国暗示，签订盟约的关键取决于德国对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态度^⑤。

因此，日本加入三国同盟的根本目的在于南进，只要日本不放弃南进，它就不会脱离三国同盟，而美国为了欧战企图拉日本出三国同盟，显然是不能实现的主观臆想。

与上述分析相联系的，是美国对日本统治集团的估价。恰如30年代美国寄希望于日本政府内亲英美派改变侵略政策，美日谈判中美国首脑们则寄希望于日本政府内的所谓“反轴心派”。尽管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确实对与德意结盟的程度有不同见解，但在南进国策上基本上趋于一致。无论近卫也好，松冈也好，都不会偏离这个国策。如松冈不敢轻易向德国许诺履行盟约策应欧战，近卫也决不敢轻易背离三国同盟，改变南进趋向，因为日本法西斯军部独裁政体支配着政府的外交行动。而赫尔、格鲁、包括罗斯福都对近卫寄予厚望，以为只要在中国问题上妥协，就会加强日本对轴心联盟的离心作用。松冈被清除内阁后，格鲁多次致电国务院，说这是日本脱离三国同盟的征兆，要求罗斯福和近卫会谈，只是因为美日当时已无法达成妥协，会谈才没有成功。罗斯福等人甚至认为，近卫内阁的灾难就是美国的灾难^⑥。其实，近卫与松冈在三国同盟的问题上没有原则分歧，只是松冈更多地要求策应欧洲战争。近卫以三国同盟问题为诱饵，完全是引诱美国在中国问题上让步。1940年月9月28日，近卫在作时局演说中明确表示：“日德意三国共同为打开旧秩序而不断努力，即德意在欧洲建设新秩序，日本正决心在大东亚地区按亚洲本来面目建设新秩序，……日本在东亚，德意在欧洲，应居于领导这个共存共荣圈的地位。……那么日本协助德意，德意协助日本，互相帮助，以至于根据情况还要发挥军事同盟威力，这也是必然趋势。”^⑦松冈倒台后，第三届近卫政府马上致电德国，表示日本仍忠实于三国轴心精神^⑧。

显然，美国拆散轴心联盟的努力是徒劳的。美国欲与轴心国联盟相抗衡，就应找到可以依赖的现实力量。在远东，必须把中国抗日战场作为实施“先欧后亚”战略的重要基地。

日本南进的最大障碍应该说就是中国战场的牵制。1939年冬，中国军队在南宁和武汉发动大规模攻势，给日军以重创，拖住了其南进的后腿。英伦三岛告急之时，日本陆军主力陷于中国不能自拔，无法借此机会进攻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新加坡。三国同盟建立之后，美国有识之士纷纷要求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给予全力支持，认为这是抑阻欧亚法西斯的有效手段^⑨。美国首脑也确实因为世界局势的重大变化而修订其对华政策，有限地支援中国以拖住日本南进的后腿。但是，美国直接参战前，其政策制定者们并没有真正把中国看作反法西斯战争中同舟共济、相互依存的战斗伙伴，看作世界战略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美国军方人士更是抱着西方大国主义态度无视中国战场的战略作用，把中国看作一张可以与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在美国陆海总长马歇尔、斯塔克眼中，远东几乎找不到施行“先欧后亚”战略的现实力量，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达到目的^⑩。这证明美国政策制定者们怀有何等的偏见，以至于人为地在战略制定与战略实施间造成如此巨大的沟壑。日本参加三国同盟和要求与美谈判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促成中日战争的早日结束，放下包袱南进与美国决一雌雄。客观地讲，从1940年6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在援英抗德中之所以获得一年多太平洋地域的安宁，根本因素是中国抗战对日本侵略者的牵制。美国以中国利益为代价去达到拆散三国同盟的目的，实在是舍本求末，险些滑到丧失远东反法西斯战线的边缘。

（下转98页）

农业奴隶的生活和命运,因此,从实际出发,运用历史的辩证法,深入研究现有史料,作出比较接近客观实际的推理,这无疑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注释:

- ① 张政烺:《殷契佚田解》,载《甲骨文与义殷商史》。
- ② 《国语·周语》
- ③ 《汉书·食货志》
- ④ 《诗·载芣》
- ⑤ 《诗·嘻嘻》
- ⑥ 《后》下41.15
- ⑦ 《国语·周语》
- ⑧ 《诗·鸛羽》
- ⑨ 《奴隶制时代》
- ⑩ 李济:《殷墟有刃石器图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
- ⑪ 安志敏:《殷墟之石刀》,《燕京学报》1947年第33期。
- ⑫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

(上接109页)

注释:

- ① 拉歇尔·布查兰:《美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外交文件集》,哥伦比亚大学1972年版,第28页。
- ②⑬⑭⑮⑯⑰ 鲍尔·斯诺德:《轴心联盟与日美关系》,纽约1958年版,第15—16页、第一章、第30—32、173、128—130、62、179页。
- ③④⑩⑫⑬⑭⑮⑯⑰ 冈本、博格合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件》,哥伦比亚大学1973年版,第444页、351—352、351—352、446—447、46、153、150、351—357页。
- ⑤ 格鲁:《使日十年》,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85页。
- ⑥⑨⑬⑯ 费赫伦伯克:《不宣之战》,纽约1967年版,第7—8、292、320—321、152页。
- ⑦ 理查德·伯斯:《危机中的外交家们》,加利福尼亚大学1974年版,第111页。
- ⑧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外交政策1932—1945》,纽约1979年版,第242页,240页。
- ⑪ 戴文、罗伯特:《不情愿的参战国》,纽约1979年版,第97页。
- ⑬⑮⑯⑰⑱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116、119、121、25—36、56页。
- ⑭ 戴维斯·林德赛:《战争是怎样到来的?》,纽约1942年版,第151页;安德森:《美孚石油公司与美国的东亚政策,1933—1941》,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第153页。
- ⑮ 莫利森:《两洋战争》,波士顿1963年版,第33—34页。
- ⑰ 萨姆莱·罗斯曼:《罗斯福公开书信集》,第4卷,纽约1941年版,第587页。
- ⑱ 弗雷德里克·穆尔:《同日本领导人一起》,纽约1942年版,第173—174页。
- ⑲⑳㉑㉒㉓ 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日本)1931—1941》,第2卷,华盛顿1943年版,第138—143、398—402、402—410、412、486—490、486—490页。
- ㉔㉕ 科德尔·赫尔:《赫尔回忆录》,第2卷,纽约1948年版,第999—1001、442—443页。
- ④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页。
- ㉖ 周恩来:《论目前战局》,1941年6月14日《解放日报》。
- ㉗㉘ 阿诺德·托因比等著:《轴心国初期的胜利》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943页。
- ㉙ 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上册,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 ㉚ 赫伯特·菲斯:《通往珍珠港之路》,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3页。
- ㉛ 沃森:《参谋长,战前的计划与准备》,华盛顿1950年版,第121页;乔治·马歇尔:《考验与希望》,第194—196页。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